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

考古学研究

(五)

上册

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
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为庆祝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而编辑的学术文集。全书共收录各类文章 70 篇,分上下两册,内容涉及中国考古学中的诸多研究领域。书末附有邹衡教授的学术事迹年表及论著目录。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文物、历史、古文字学等相关领域研究的专业人员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

ISBN 7-03-011396-9

I. 考… II. 北… III. 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807 号

责任编辑:闫向东 / 封面设计:王 浩

责任印制:刘秀平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3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67 1/2 插页:28

印数:1—1 200 字数:1 480 000

定价:240.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錫編青
山
乃
未
壽
書
奉

鄒衡同志
張
汝
煥
乙
丑
冬
同
在
垣
曲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编委会

主任 邹 衡

编委	宿 白	邹 衡	吕遵谔
	李仰松	高 明	严文明
	陈铁梅	李伯谦	马世长

秘书 徐天进

《考古学研究》(五)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奎 水 涛 刘 绪 孙 华 徐天进

序 言

2002年1月30日是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今年又是他从事考古研究工作五十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为他编辑了庆祝文集，邀我在书前写些文字。由于多年工作在一起，我对他有较深的了解，因此就答应了。

邹衡先生大学本科先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史学系。1952年本科毕业后，在历史系攻读副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中国考古学。这是解放后北京大学第一次招收考古学方面的研究生，而且仅招了一名，历史系聘请郭宝钧、苏秉琦、张政烺三位先生做他的导师。1955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一年后又调回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从事商周考古的教学和研究，直到现在。

邹衡先生对考古非常热爱和执著。20世纪60年代，为了对殷墟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期，他每天一早从北大出发，到城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查阅相关资料，中午以自带的咸菜和馒头为午餐，下午直到考古所下班才离去，竟持续了整整一年。从他1964年发表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殷墟已发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收集研究。至今，在有关殷墟文化分期的诸多文章中，该文仍是系统的、全面的，内容涉及陶器、铜器、墓葬和建筑遗迹，甚至还有部分甲骨文。现在看来，绝大部分结论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白专”受到批判，大学一度停办，不少人对今后能否从事专业研究产生动摇，在运动中不敢也无心从事研究。邹衡先生则不然，他时常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学问。1976年京津唐地区大地震，凡住楼房的人家都搬进了临时防震棚以防不测，可他舍不下自己的书房，舍不下自己的研究。一到夜晚，全楼时常惟他一户亮着灯光，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文革”结束不久，他即相继出版了两本专著，《商周考古》出版于1979年，《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出版于1980年。按他当时的设想，这两本著作完成后，接下来从事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在田野发掘的基础上出版一部考古发掘报告；一是通过对三代铜器的系统研究出版一部关于青铜器的论著。因此，当《商周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送交出版社之后，他就马上选择发掘地点。1979年下半年，他带数名本科生和一

名进修教师在山西翼城县和曲沃县进行晋都调查,最后认为天马-曲村遗址最有可能是晋国始封地。在他的建议下,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77级)于1980年在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田野考古基础实习,开始了该遗址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直到现在,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工作一直在进行。其中仅80年代,大规模的发掘就有6次,获取一大批珍贵资料。从1988年开始,他亲自组织和参加了这批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写。为了早日完成这项工作,他不分寒暑,长期住在曲村,甚至有一年春节都是在曲村度过的。1994年,报告初稿完成,修改转回北京。因报告规模大,资料多且不宜分散,只能放在教研室。若住在家里,每天往返耽误时间,而且晚上无法利用,于是他干脆住在教研室,每日三餐在学生食堂,长达二年有余,此时他已年近七十。2000年《天马-曲村》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其规模之大,资料之全、印刷之精,在大陆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实属罕见,最近获美国一项著作奖。从1980年开始发掘到2000年报告出版,整整20年时间,邹衡先生从天命之岁步入古稀之年,翻一翻《天马-曲村》,就会感觉到他为之付出的无限辛劳。

在80和90年代,他指导了不少研究生,为了使研究生掌握更多的知识,写好论文,他经常带学生到外地参观,并亲自选择发掘地点,先后到过山东、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和新疆等地。有时还参加发掘和整理。1986年他与学生一起在陕西扶风县发掘,1985年和1988年他利用暑假带领学生在山东菏泽和河南淇县整理发掘资料。据说淇县的条件很艰苦,一个破旧待拆的会堂是他和学生们的整理间兼卧室。会堂周边堆满了木料和农具,角落里还有一口棺材。中央部分用于架设床铺和整理。白天酷热难耐,晚上蚊虫叮咬,老鼠乱窜。他一住就是一个假期。

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是他一贯的作风,在80年代以前,他就多次参加和主持过学生的考古发掘实习,每次都亲临现场,亲自动手,从发掘到整理,各个环节一丝不苟。1957年参加河北邯郸涧沟、龟台寺等遗址的发掘实习,这对他后来提出先商文化产生了直接作用。1959年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的发掘实习,第一次对豫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细致的分期。1961年参加了北京昌平雪山的发掘实习,提出了雪山一期、二期、三期文化的概念,其中“雪山三期文化”即后来学术界所谓的“夏家店下层文化”。1965年主持了山东临淄故城的发掘实习。遗憾的是,“文革”前的这些发掘资料,包括已写就的发掘报告多在运动中散失,一直未能面世。但邹衡却因这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工作形成了诸多认识,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坚实的田野考古基础与刻苦、勤奋、务实的精神，使他对所研究的对象有了深入的认识，在夏商周考古学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

50年代以前，学术界认识到的最早的商文化是殷墟商文化，50年代初，郑州二里岗和辉县琉璃阁商文化的发现，使人们意识到二里岗商文化可能是比殷墟更早的商文化，但第一篇详细论证二者关系的文章是邹衡先生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从而使这一问题成为定论。

殷墟发掘始于20年代，有的学者对部分器物的演变进行过研究，然第一位对殷墟商文化进行分期的是邹衡先生。早在1956年，他在《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一文中即把商文化分为三期；60年代初，又进一步分为4期7段；70年代他又对整个商文化进行了全面分期，上起由他提出的先商文化，下迄殷墟晚商文化，共计7期14段，建立了完备的商文化分期系列。经长期验证，该系列是可靠的，已成为学术界比较研究的基准。

在1977年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亳都，二里头文化晚期是早商文化，郑州商城是隰都，二里岗文化是中商文化。邹衡先生首先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在1977年冬召开的第一次夏文化研讨会上，他发表了出人意料的看法，认为二里头遗址并非亳都，二里头文化从早到晚都是夏文化，郑州商城才是亳都，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由于他的看法与普遍的意见相左，因而在发表之初，受到不少学者批驳，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把夏文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直到现在，有些问题仍然是围绕着他的观点展开讨论的。经过20余年的争论，他的看法，比如二里头文化早晚四期均为夏文化、二里岗文化为早商文化、漳河型文化为先商文化等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

在周文化研究方面，按传统的认识，周人灭商之前的文化面貌十分渺茫，邹衡先生是第一个对先周文化进行详细研究的人。他不仅首先提出了“先周文化”这一概念，并首次对先周文化进行了分期和文化因素分析。不仅辨认出先周文化的陶器，更重要的是还辨认出一大批先周文化的青铜器。而在他之前，学术界对周人青铜器的认识只限于西周时期，最早都不外常被人提及的大丰簋和利簋。自从他的《论先周文化》发表之后，学术界探讨先周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外，他还认定了两处西周诸侯国的始封地，一是燕国始封地，今琉璃河遗址；一是晋国始封地，今天马-曲村遗址。

总之，在夏商周各时期考古学研究方面，他都有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甚至引起长期和广泛争论的见解，足见其分量之重。

对三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就多数人而言，往往是分别将各代作单一的探讨，而邹衡先生则不然，他在研究各代考古学文化的同时，还注意与之相关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如对夏文化的研究，他是从研究商文化入手的，不仅涉及早商文化，还涉及到先商文化，既注意了纵向的夏商更替关系，又注意了横向的夏与商的并列关系。又如研究先周文化，既注意了先周与西周的关系，也注意了先周与商和姜炎的关系。所论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不仅有陶器，而且还有其它遗物（如铜器）和古文字、古文献材料等。他的代表性的考古论著都有类似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研究结论也形成了独自的体系。

邹衡先生作为北大考古系一位教师，能够在学术上做出这样的成绩，我确实为之高兴。大家纷纷撰文以祝贺他的七十五寿辰和他 50 年的考古奉献是理所当然的。论文数量多达 70 余篇，我无暇细细过目，仅翻阅大概，不论内容属哪些方面，能积极撰文参与，就是对邹衡先生的学术成就的有力肯定。

宿白

2002 年 4 月 10 日

目 录

上 册

序言	宿 白 (i)
我和夏商周考古学	邹 衡 (1)

壹 述 评

20 世纪夏商周研究的进展	蒋祖棣 (13)
邹衡先生与夏文化探索	陈 旭 (25)
二十年的论战	董 琦 (37)
穷亦乐 通亦乐——浅识邹衡师学术风范	李维明 (45)
踏破铁鞋有觅处——记考古学家邹衡先生	林小安 (58)
他与洛阳缘分深——访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授邹衡先生	周 军 郎保香 (62)
一部空前的考古学巨著——《天马-曲村》读后感	水 涛 (64)
两部巨著 一生辉煌——邹衡先生论著读后	徐自强 (68)
情系夏商周——邹衡先生访谈录	闫向东 (75)
“推翻历史三千载”——记考古学系教授邹衡	王曙光 (84)
一位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的普通人——写在著名考古学家、我的父亲 邹衡七十五寿辰之际	邹晓天 (89)

贰 新石器时代

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赵朝洪 吴小红 (95)
邓家湾考古的收获	严文明 (105)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结构研究	何介钧 (111)
贾湖类型是海岱史前文化的一个源头	邵望平 高广仁 (121)
论龙山文化景阳岗类型	张学海 (129)
环太湖地区文明进程的新课题——从好川与广富林的新发现谈起	宋 建 (146)
关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	郑杰祥 (161)
五帝时代与夏代史迹的考古学观察	王 迅 (170)

叁 夏商时代

夏商文化分界探讨的思考	刘 绪 (181)
夏文化解析与史实释读	李维明 (201)
夏都斟寻与商都亳合考	张立东 (213)
朱开沟文化研究	田广金 韩建业 (227)
盘龙城遗址的分期及城址的性质	陈贤一 (260)
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与文化变迁	王 宏 (278)
塘坊坪文化初论	张天恩 (295)
中国冶铜术起源的若干问题	彭适凡 (312)
商代马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杨宝成 (330)
铜斧文化圈	〔韩〕李宾汉 (346)
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	王宇信 (359)
卜辞滴水探研	罗 琨 (371)
商代日始论辩——兼及“己未夕翌庚申月有食”之年代	常玉芝 (381)
试论殷代的纪时制度——兼谈中国古代分段纪时制	宋镇豪 (398)
枋、祔祭礼的称谓系统——兼论黄组卜辞的时代	葛英会 (424)
甲骨文「文字域」研究	〔日〕铃木 敦 (436)
甲骨文的艺术性考察	〔韩〕李永徽 (451)
古文“夏”字再考——兼论夏矢、宜侯矢、乍册矢为一入	曹定云 (482)
评《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	谢 济 (493)
释“三亳”	程平山 (505)
论夏商时代的主辅都制	张国硕 (518)

下 册

肆 周 代

周原遗址考古的成就和思考 (1949~1999)	刘士莪 (537)
沔西发掘与武王克商	王恩田 (550)
洛阳西周时代的遗址与成周、王城	〔日〕飯島武次 (557)
成周、成自、王城杂谈——兼论宗周之得名	王占奎 (572)
也论金文中的“周”	曹 玮 (581)
宜昌上磨垸周代文化遗存的讨论	杨权喜 (604)

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考古研究	刘彬徽 (613)
试论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	〔韩〕安信元 (632)
从《诗经》看古人观念中的玉	张永山 (670)
论新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骑马民族文化遗存	水 涛 (679)
楚章华台考	陈跃钧 (692)
战国时期楚漆器群研究	陈振裕 (701)
平首尖足布新品数种考述——兼述尖足布有关地名	黄锡全 (720)
竹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	吴九龙 (730)
曾侯乙墓漆箱天文图证解	武家璧 (738)
论江南地区土墩墓与中国古代坟丘起源的关系	杨 楠 (749)
The Bronzes from Xiasi and Their Owners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755)
先周文化的探索历程	雷兴山 (787)
西周王朝的发祥之地——周原——周原考古综述	徐天进 (799)

伍 其 他

我看顾颉刚的“疑古”	叶林生 (811)
古史辨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	刘起钎 (820)
礼与礼器——中国古代礼器研究札记之一	张 辛 (851)
中國初期王朝の出現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	〔日〕西江清高 (907)
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	孙 华 (921)
科尔沁沙地沙漠化正逆轮回的人地关系初探	宋豫秦 (949)
长沙走马楼孙吴简牍的两个问题	方北辰 (970)
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辨误	王 素 (973)
碧落碑中之古文考	陈炜湛 (979)
金代磁州窑的繁荣及其原因探讨	秦大树 (990)
中国古代藏书考	林梅村 (1013)
邹衡先生主要学术事迹编年	李维明 (1025)
邹衡先生发表论著简目	李维明 (1046)
编后记	(1052)

我和夏商周考古学

邹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學術問題好比一條長河，
沿途會有不少固障險灘。
越過一灘，又會遇到其他險
阻。研究學術問題，就是越
過一道道障礙不斷前進的。

鄒衡



一九九八年十月

一、我的简历

1927年1月30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澧县的一个偏僻的农村。9岁才入小学,两年后,中日战争爆发,我整个中学生活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1947年,我考进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毕业后又做了三年的考古研究生,师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先生,专门研究商周考古学。结业后分配工作至兰州大学,教了一年的考古学通论和中国古文字学。1956年我被调回北京大学历史系,接替郭宝钧先生讲授商周考古学。1978年升任副教授,1983年为教授。50年来,我基本上没有离开北京大学。

我从事考古工作是半路出家的。我刚入北大,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感到新颖,不知如何观赏是好。我入法律系,只不过是為了谋取公费而已,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法律系要学些什么。当时北大的名教授甚多,有些教授,我在中学时期就久闻其名的。好在选课或旁听都很自由,可以随意听课和参加各种学术讲演会。在法律系,除了周祖谟和冯文炳合开的大一国文、朱光潜和潘家洵合开的大二英语外,许德珩的社会学、钱端升的政治学、赵迺传的经济学和芮沐的民法学等就是必修课。选修课我只选了两门:一是向达的中西交通史,二是邓广铭的中国通史,后者胡适曾讲过其中的某些章节。此外,我的主要精力,全放在旁听课中。例如贺麟的黑格尔、郑昕的康德、罗常培的语言学、俞平伯的词选、沈从文的小説习作、郑振铎的小説名著选读、吴晓铃的戏曲史、胡适的水经注和唐兰的古文字学我都旁听过。1949年初,不少民主人士自香港汇集北京,北大邀请了一些有名学者如郭沫若、马寅初、侯外庐、翦伯赞等来给我们讲课,我都认真地听讲和记笔记。

我听的课目越多,对法律系的兴趣就越淡,对文史哲的兴趣越浓,后来更侧重于史学,这是我转入史学系的主要原因。入史学系以前,我阅读的参考书也是以史学方面的居多,尤其喜欢读郭沫若有关历史方面的书,甚至包括他写的历史剧本在内;尽管有些书我读不太懂,也拚命地啃了下来。

入了史学系,我接触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张政烺先生,他开设的三门课,即中国古代史、甲骨文和古器物学,我都选修了。我觉得他学识渊博,有问必答,导致我对中国古代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想终身从事甲骨文的研究。第二位老师是郭宝钧先生,我听了他的殷周考古,觉得他讲的课同史学系其他的课大不一样,而别有意趣。第三位老师是夏鼐先生,他讲的是考古学通论。听完他的课,我才知道考古学是另一种学问,而且同自然科学有较密切的联系。他讲了许多西方考古学的问题,使我对世界考古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明确了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根本离不开考古学。结合着西洋上古史的学习,更认识到考古学是非常重要的—门科学,它的学术地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高。恰当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即将开办考古专业,我便成了考古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

二、我和夏商考古学

我是带着一定的学术目标来攻读殷周考古研究生的。关于这一点，郭沫若的书对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郭沫若的著作中，我发现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难题没有解决，致使他终身遗憾。这三大难题是：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国青铜时代分期时，仅仅提到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时期，而未作任何解说。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时，不只一次地说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有而感到遗憾。三、夏文化问题，他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我当时存在一种幻想：这三大难题固然在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不是能在考古学中求得解决呢？从此，我便肩负这三大难题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决心为此奋斗一辈子！原来我本想专攻古代文字，现在看来，古代文字既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况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不可能兼顾二者，只好舍弃古代文字而专攻考古学。

考古学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在大学阶段，我并不是专攻考古学的，只不过听了两三门考古课，可说并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非科班出身的我，自然感到困难重重。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有二：一是田野考古，我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二是研究古代器物，我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围绕着这两大困难，首先在书本上寻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书籍外，特别注意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查寻资料。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图书还不多，找来找去，只有四套图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就是《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田野发掘的缘故。

我首次参加田野发掘是在郑州二里岗，这是一处大规模的商代遗址。1949年以前，尽管考古工作者经常路过郑州，却无人留意此处遗址。我能在此前后工作两年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的考古生涯就是以此处为基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郑州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是漏雨的茅草房，冬天用的火炉也不很暖，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出门上工地都是背着工具等步行。不过，回想起这段生活倒是很有意义的，并不觉得是如何艰苦，因为当时我满怀着一颗要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

在工地上我首先碰到的是地层的划分，我经常同工人们在一起讨论，不断地解决了我从书本上带来的许多疑难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终于在田野中找到一套可行的方法，把田野技术提升到另一个高度。

室内整理是田野考古中更重要的工作。所谓考古学研究基本上应该从室内整理开始。我的室内整理方法主要就是在郑州摸索出来的。特别是粘对陶片，是一项非常烦琐的需要高度耐心的工作。我同工人们一道，不厌其烦地相互切磋，也找出了一套可行的方法。关于如何分类、如何统计、如何比较，是不断有所改进的。我应该特别感谢裴文中先生。他当时是中央文物局的处长，曾长期在郑州指导工作，我可以经常向他请教。他是学旧石器的，只着重对动物遗骸的辨认、分类和统计，对陶片他并不十分关心。但

是，我却从他如何观察动物遗骸的工作中得到很大的启示，并把他的这种方法经过消化移植到陶片上来。总之，我在郑州两年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考古发掘与整理研究，并总结出了一整套田野方法，对以后我的考古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对以后的考古教学也是大有好处的。

我对商文化的研究就是在郑州开始的。在 50 年代初期，我曾把郑州的商文化分成了三期，并把它同殷墟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在当时，曾经有人提出来郑州的商文化早于殷墟文化，但这只是笼统而言的，并未作出具体的论证。要论证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对殷墟文化进行分期。殷墟是 1949 年以前发掘的。当时参加殷墟发掘者有不少著名学者，如李济、梁思永等人，但他们都未能对殷墟文化进行过分期。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自然是相当困难的。殷墟的发掘资料都已运往台湾，我无法看到，我只能根据从书本上看到的极少量资料进行研究。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搜集和反复排比，我发现有地层证明殷墟的陶鬲和陶簋都能排列出早、中、晚的系列，当时辅导我的苏秉琦先生得知后特别高兴，并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我终于把殷墟文化主要从陶器上划出了期别，并把郑州同殷墟的早晚关系基本上弄清楚了，证明了郑州二里岗文化早于殷墟文化的早期，而郑州商文化的晚期只相当于殷墟文化的中期。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说是破天荒的，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国内，大体上都是赞同的，在国外则有不同的反映。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汉学家曾把我的殷墟文化分期同董作宾的甲骨文分期看成是同等重要的。这对一个青年学者来说，当然是莫大的鼓舞。可是，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人存在怀疑的态度，这主要是来自日本的学者。1956 年，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日本访华团中，有几位学者曾经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质疑，我曾与他们在北京饭店进行了激烈的争执。这场争论直到 60 年代后期才算平息下来，我的这个论点才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公认。

然而，殷墟文化的分期并未就此完结，还有更大的困难等待我去攻克，这就是关于商代铜器的分期。商代铜器早在北宋时期就曾批量出土，而自北宋至清代，从无一人进行过年代分期，甚至连夏商周三代的铜器也不能明确地分辨。现代研究铜器成绩卓著者郭沫若先生，他对周代铜器的分期曾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对商代铜器分期却不置一辞。其他如容庚先生、唐兰先生和陈梦家先生都曾对商周铜器做出贡献，但其成绩也都未超过郭沫若先生，其对商代铜器分期也皆缄默不语。曾直接参加过殷墟发掘的李济先生试图用最现代化的方法剖析过殷墟铜器，但结果也是无法断代。因此，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陈梦家先生曾几次劝告我：“殷代铜器是不能分期的。我研究殷代铜器多年，也没能分期。你不要再进行这项工作。否则，就只会浪费时间，弄不出什么结果来的。”可是，我并没有就此止步，一直钻研了十来年。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这就是考古学。我根据考古学的地层和共存关系，找到了铜器间的相互联系，又用陶器的变化作为旁证，对殷墟铜器成功地进行了分期；并根据甲骨文的断代，推断出了各期的绝对年代。以前的学者之所以不能对殷墟铜器进行分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铜器的缘故。

我在研究殷墟铜器的同时，还顺便对甲骨文的分期作过一点修正。董作宾的甲骨文分期是基本可信的，只是其所分的甲骨四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四期中有一部分甲骨，即所谓自组、子组和午组等卜辞，学术界存在着意见分歧，长时期没有最后解决。日本的甲骨学权威学者贝塚茂树先生不同意董作宾的意见，主张这类甲骨属于武丁之时，国内学者如胡厚宣先生和陈梦家先生大力支持贝塚之说，可是在整个甲骨学界并未普遍认同。我仔细地分析了殷墟的地层，发现自组等卜辞与其所处的地层矛盾，又在墓葬中自组字体的陶文与共存的铜器不合，从而肯定了自组等卜辞决非属于四期，而应归入一期。从此，贝塚之说成了定论。贝塚得知后分外幸喜，并同我成了知交。

我的论文《论殷墟文化分期》发表后，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普遍地赞同。在美国许多博物馆中都用我的商代铜器分期陈列其所藏中国铜器，在日本、德国和英国的考古学界和博物馆学界也都广泛地予以运用。其实我那篇论文的目的，不仅是商代铜器的分期，而是论述商代文化的分期，更全面地补充论证郑州商代遗址早于殷墟遗址，论证殷墟文化的源头就是郑州的商文化。这一论点的确立，早商文化的轮廓就可大致勾画出来了。殷墟是盘庚所都，早于殷墟就是早于盘庚迁殷，从而郑州的商文化自然就属于早商文化，即盘庚迁殷以前的“殷商前期”文化了。

在郑州，不仅发现了大范围的早商文化遗址，而且发现了周长 7 公里的城墙和总面积 6 万平方米的宫殿基址，并出土了成批的早商铜器。考古学界公认，郑州必定是早商时期的国都。究竟是哪些商王的国都？学术界又进行了 20 多年的讨论。主要有两说：有人以为是仲丁所迁的隰都；我则认为是商汤所居的亳都。据《左传》等所载，距郑州不甚远处有隰地；又记载，郑地也有亳地，且郑州商城出土战国陶文中有“亳丘”二字，亳丘就是亳墟。仲丁居隰只有一代二王，与商城的年代不合；亳城自商汤以后共五代十王居此，与商城的年代恰好相合。我研究亳都说是把以往所有亳都诸说都作了实地考察，发现诸亳都说不是文献记载有误，就是找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明，因此都不可能是商汤的亳都。最近在郑州西北的隰地发现了大规模的早商偏晚的遗址和宫殿基址，其为隰都无疑；可是此隰都并不在郑州。去年召开“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多数学者皆同意郑州亳都说，这场争论才基本上有了结果。郑州商城既然是商汤所居的亳都，就进一步确定早商文化的年代直可到商朝始立国之时，从而把我国的信史提前了二三百之久。

郑州商城为商汤亳都的确定，不仅提前了我国信史的年代，而且为探讨夏文化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夏王朝是被商汤灭亡的，所以夏王朝必然早于商汤之时。根据考古学的地层关系，早于郑州商城的地层自然有可能属于夏时的地层了。我就是依据这条线索来探讨夏文化的。经过 10 多年的研究，我首先推断商文化并非起源于山东省，而是起源于太行山的中部，即河北省西南与河南省的北部一带，因为惟有这一地区才发现有早于商汤的商文化即先商文化。在河南省的洛阳地区发现了另一种不同于先商文化的偃师二里头文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商朝的先公曾在先商文化区域活动，而洛阳地区却是夏朝的大本营。再通过夏商两朝部分礼制的比较研究，最后我推断洛阳地区的二

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我研究夏文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追溯，即论证郑州商城为商汤的亳都，亳都以前的文化自然有可能是在夏朝的年代范围了。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紧压，这就是要从新石器时代研究开始，以确定夏朝从何时开始建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还没有明确的分期。1959 年，我选择了洛阳的王湾遗址作为突破点，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二三十名学生在此进行了大规模地发掘。结果把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首次做出了细致的分期。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可说是大创举，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得知后都大加赞赏，并极力支持。可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容许把我的论文公诸于世，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尽管如此，我总算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情况弄清楚了，这对我以后研究夏文化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就是说，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从早到晚都不可能是夏文化。

除此之外，还要研究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其他文化。我主要研究了三种文化，即河北省境内的先商文化、长城内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山东省的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我虽然没有参加发掘，却曾带领学生整理过其发掘的材料。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我都参加过发掘与整理，对其文化内涵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经过系统地比较研究，最后证明这三者皆不可能是夏文化。

当我首次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时，考古学界都不甚理解，因而赞同者甚少，无论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都纷纷反对我的意见，文章不下百十来篇！国外的学者竟无一人赞同。他们认为偃师二里头是商汤立国的所谓西亳，二里头文化主要是早商文化。这两派意见僵持不下，甚至延续了 10 余年之久。我完全处于孤立的地位，但我坚持的观点从未动摇过。后来在偃师又发现了一座商城，多数反对派学者乃放弃了二里头西亳说，改换为偃师商城西亳说。因为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是同时兴建的，两者都晚于二里头文化，于是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之说便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1997 年 11 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全国性会议，才基本上肯定了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其实，偃师商城并非商汤首都西亳。据我的考证，它只是早商时期的陪都或离宫，如同洛阳是西周时的陪都一样。太甲之时，曾被放逐于此，所以又称为桐宫，古代文献如《吕氏春秋》和《晋太康地记》都有明确的记载。何况郑州商城比偃师最早的商城大了几倍，商汤决不会舍弃大城郑州商城而居于小得多的偃师商城。如果商汤是以偃师商城为首都，那与商汤伐桀是自东方攻向西方、灭了夏又回到东方的亳城的文献记载不合。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清楚，用不着再讨论了。

三、我与周代考古学

周代考古学我是从研究先周文化开始的。先周是指周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先周文化一词也是我首先提出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我国历史学界兴起了研究先周社会性质的高潮，尤其集中对先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探讨。经过较长时期的讨论，终未得出统一